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走出傷痕

——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

張子樟 著

痕 傷 出 走



一 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

著 張子樟

滄海叢刊

1991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自序

文學作品的演進並非純粹是一種進化過程，「今不如古」或「古不如今」的說法都值得再三斟酌。就中國現代文學的演進而言，用「演化」二字來說明文學作品受現實環境的牽制與互動，似乎來得更為貼切。既然認定文學的演進是種演化過程，作品是否能充分截取、收錄與傳達某個時代的社會部份風貌、記錄歷史片斷、凸顯人性表徵，成為評論的一些標準。以上面這些話來論斷文革後的大陸小說的內涵與技巧的演進，便顯得十分公道。這些標準也就是筆者撰寫這本書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這本書為筆者研究文革後大陸小說的第二本書。第一本書《人性與抗議文學》出版於一九八四年。當時由於時空的種種限制，該書引用之小說，幾乎全以揭發文革期間黑暗面的「傷痕文學」為主，部份作品雖有「反思」之意味，但不够深入。經過將近四十年的長期壓制後，作家能再發揮大無畏的精神，為民鳴放，已經相當不易。

一八三年後，大陸小說進入高潮。藝術技巧的提升與深化，使得作品日益哲學化。在「創作自

由」的吶喊聲中，作家不再沉湎於往事之追憶，而積極地以文化意識與自我意識為經，現代藝術技巧為緯，寫下了不少足與三十年代大家比美的作品。本書便是以這些作品中展現的三種主要精神現象——「疏離」、「調適」與「超越」——為主，前後約十一年（一九七七年底至一九八八年底），長篇、中篇與短篇作品均為篩選取樣的對象。

其次談到本書的理論架構與應用。本書除依賴純粹的文學理論來解說作品的諸般現象外，還借助部份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和哲學上的論點來剖析作品內容。期望藉多角度之省察，達到全方位觀照之效果。另外，這本書是以作品中呈現的共同現象為主的研究，不同於純粹以作家作品為主的專題研究。筆者以為，從同一代人對同一問題不同角度來互參觀照，再經過互相印證、駁詰與補充，其中蘊含的時代深刻特點，應該比較容易把握。

在深入討論作品內涵之前，必須對小說中的「角色」予以定位。我們不難發現，文革後小說作品中的「角色」已徹底擺脫七六年前的英雄形象的刻劃，凸顯並確定了「人」的地位。作家不再受政治所左右，而刻意塑造虛假之英雄典型或正面人物。他們描繪了在現實生活中浮沉不定，具有七情六慾的常人與小人物，真正展現了恆久與普遍的人性。

由於現實政治的扭曲與權力的濫用，大陸社會各個層面均存在著濃厚的「疏離」現象，尤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更為嚴重。「自我」的失落、人性的沉淪與集體疏離現象是探討「疏離」現象的重點。有趣的是，作家本人亦具有嚴重之疏離感。他們不僅與社會疏離，也與自

我疏離。

經年累月的天災人禍造成大陸人民常常處於遷移狀態。為求生存，他們不以遷移為苦。在遷移過程中，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便產生了。以社會學中的遷移現象與心理學中的調適方法為學理依據，深入探討小說中的主人翁如何在大動亂中，在不同的遷移情境中，調適自己的心態，是本書的另一個觀照角度。

「生」與「死」(to be or not to be)是古今中外文學作品恆久不變的主題。借用文化意識與自我意識為主要的觀照角度，更能把握「生存意識」與「死亡意識」之「內涵」意義。食色問題的揭發也凸顯了作品已從突破邁入超越。作品表現手法的突破與超越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意識流的復古、語言敘述的突破、作品的哲學化、新寫實主義與後新潮小說的出現等等，確定了這些作品的歷史地位。知識分子、婦女與農民這三個重要角色的自我超越現象，顯示了作家的道德勇氣。作家以自我拷問的方式審視知識分子是最宏偉的超越現象。

無可諱言地，這個階段的小說作品已有相當可觀的成就，語言與敘述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藝術技巧的深化使得作品更具哲學意味。但作品本身依然有不少問題值得深入研究的，如角色形象的塑造、技巧的應用仍有缺失。現今文壇上滿佈「浮躁」之氣，使得原有的「焦灼感」更為明顯。

以上這些話是這本書的簡介。筆者興趣廣泛，小說是最愛，但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與哲

學亦略有涉獵。在撰寫本書時，常不知不覺將對上述學門所知的一些粗淺知識融入文中，使得本書借助之研究方法頗為駭雜。另外，書中引用之作品全是筆者能找到的作品，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這些都請讀者諒解。

這本書能順利完成要感謝許多前輩與好友。呂正惠教授、白杰明 (*Gereme Barmé*) 教授、李超宗教授與蔡源煌教授對本書數章或全書的架構與內容，都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意見，讓筆者能把本書修改得更完整。筆者同時要向三位指導教授——謝高橋教授、先師侯健教授與劉紹銘教授——表示最誠摯的謝意。由於他們的諄諄教誨，筆者才有勇氣撰寫本書。另外，好友周玉山兄功不可沒，本書數章都是由於他的「陷害」而硬擠出來的。何志韶先生與佟立家先生在資料搜集方面幫了不少忙，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最要感謝的是三民書局兼東大圖書公司的主持人劉振強先生。由於他的慷慨，像本書這樣硬的書才有機會與讀者見面。最後謝謝內子蘇月英女士，多年來她寬容筆者徘徊於學術邊緣。

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一、歷史的回顧.....一
- 二、研究方法與目標.....四
- 三、角色變遷、疏離、調適與超越.....六

第二章 現代英雄的探索旅程——角色變遷

- 一、前言.....一三
- 二、英雄的類型及其探索.....一四
- 三、第六種英雄.....一八
- 四、「傷痕」與「反思」.....二十四
- 五、新題材、新寫法.....三〇

第三章 社會、自我與人性——疏離現象

六、結語

三五

一、前言

三九

二、疏離文學

四一

三、時空變遷下的疏離

四八

四、白色恐怖雲霧下的集體疏離

五二

五、在蜘蛛網中掙扎拼鬥的人們

五五

六、價值觀念的顛倒

五九

七、浩劫後的預言式疏離

六二

八、結語

六六

第四章 大動亂時代的成長過程——遷移與調適

一、前言

七三

二、調適理論與實際

七八

三、下鄉插隊者的調適

八三

四、殘障者的調適

八八

五、勞改分子的調適.....	九一
六、城市人的調適.....	九五
七、結語.....	九九
第五章 從文化、自我視角觀照生死意識——突破與超越（上）	
一、前言.....	一〇五
二、文化意識.....	一〇九
三、自我意識.....	一一三
四、食色與生死.....	一一八
五、死亡意識.....	一二六
六、結語.....	一三二

目次

一 次	
一、第六章 多元化的藝術手法——突破與超越（中）	
一、前言.....	一三五
二、意識流與其他藝術手法.....	一三七
三、語言敘述與符號.....	一四一
四、作品的哲學化.....	一四三

五、新現實主義與後新潮主義 一四七

六、結 語 一五三

第七章 知識分子、婦女與農民的性格塑造——突破與超越（下）

一、前 言 一五七

二、知識分子 一五九

三、婦 女 一六八

四、農 民 一七七

五、結 語 一八四

第八章 結 論

一、訊息與技巧的轉化 一八七

二、幾點令人深思的問題 一九一

三、未來的展望 一九九

參考書目

第一章 緒論

一、歷史的回顧

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了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從此，中國的小說藝術進入另一個境界。

《狂人日記》在篇幅上只是短篇傑作，但它的問世却有幾種新的意義。首先，這篇小說延續了清末譴責小說的批判精神，挖掘社會黑暗面，關懷現實人生的種種問題，並深入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吃人的禮教》也許言過其實，但觀照現實社會，再稍加推敲，這篇作品稱得上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其次，就藝術技巧而言，它擺脫了傳統章回小說的「講故事」的舊規，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給以後的小說創作樹立了新的敍事形式的典範。雖是短短幾千字，《狂人日記》的這兩種新義，至今已影響了中國小說創作將近四分之三世紀之久。

雖然「狂人日記」肯定了小說作品的藝術價值，但三十年代的作家却始終只關注它的社會意義。他們認定小說可以改革世道人心。他們所遵循的依然是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的那段話：「欲新一國民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格，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① 這種認定小說萬能的狹窄功利主義嚴重地影響了民國以後文學史上的兩大運動：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這兩大運動把文學定為社會改革或政治變更的工具。從此，以文學改革世道人心的態度精神，瀰漫在作家之間，成為五四運動以後文學作品的主要特色。三十年代文學作品具有的強烈的社會意識與政治意識也就成為當年那些感時憂國的作家的道德重擔。他們的作品或許偏離了藝術價值，但依然有其可取之處。這些作品，「表面是批評傳統的道德倫常，實則表彰人性的高貴，……以痛陳時弊的手法，來表達他們對中國前途的深切關懷。」^② 但這種勇於暴露社會弊端的批判精神却隨着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的成立，暫時失去了光彩。

在中共宣傳人員眼中，文學只是政治的傳聲筒或宣傳品。文學是教育人民、宣傳政策的一種

① 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新小說》發刊辭，一九〇二年十月發行於日本橫濱。

②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一九七九年），頁五四九。

最佳工具，有無藝術性並不重要。一九四九年後，隨着各種政治運動的變幻無端^③，文學作品猶如風中殘燭，苟延生命於亂世。各種文學創作均隨着政策的推動而飄搖不定，毫無藝術價值可言。小說作品亦不例外。在教條框框的層層限制下，小說成爲歌功頌德的工具。「主題先行」導致小說內容的過度簡單化、臉譜化。「正面英雄」的刻意塑造使人物造型日趨僵化。「高、大、全」的說法完全扭曲了社會與個人的真正面貌。這種種的不正常現象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才一一獲得匡正。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共發生宮廷式政變，「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基於實際政治需要，中共逐漸對外開放，大陸小說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十多年來，不同程度的政治運動依然不斷，其中多數均與文學創作內容有關^④。但現實環境的諸種重大變遷已使得小說作者走上不歸路。他們勇於求新求變。他們不但延續了三十年代文學的批判精神，而且十分重視作品的藝術價值。儘管創作之路坎坷難行，作家在道德勇氣支撑下的作品，其社會功能與藝術價值依然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 參閱拙著《人性與抗議文學》（臺北：幼獅文化，一九八四年）中的第三章〈中共文藝思想之演進〉與第四章〈中共文藝理論之探討〉。
④ 如一九八一年的「點白樺，批《苦戀》」事件、「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八七年開除劉賓雁、王若望黨籍等。

二、研究方法與目標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劉心武的〈班主任〉刊登在《人民文學》上，新時期文學就此拉開序幕。十多年來，小說作品的驚人發展與成就是中外人士有目共睹的。無論是作品內涵或藝術技巧，這些塊後餘生者筆下的歷史見證都遠超過前三十年（一九四九—一九七七）內的作品，足與三十年代的大師作品比美。

大陸文藝評論界習慣把此階段的文學作品稱為「新時期文學」，又把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定為新時期文學的第一個十年，一九八八年為第二個十年的開始。本書沿用這種稱呼，但不刻意強調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由於一九八八年的重要作品在敘事形式方面有了重大的變化，本書亦將此年作品列入探討，以便對照比較。因此，本書討論引用的作品包括從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八八年底的有關作品，前後約十一年。

文學作品的演進是連貫相關的，文革後的大陸小說亦復如此。這些作品在內容上承繼了三十年代的破壞精神，在形式上也多半接納了西方當代小說的藝術技巧，絕對無法把他們視為完全單獨存在的獨立體。因此，引用中外不同時期與不同地位的作品來印證與解說這些作品，更能凸顯其承先啓後、內容豐盈的特徵。

由於作家深信「轟動效應」的說法，十多年的小說創作可以「浩如烟海」四個字來形容。如何在這些份量極重的長篇、中篇、短篇作品中篩選，也是本書的一大工作。藝術創作之優劣自古以來就有一套判斷的絕對標準。對處於轉型期的大陸小說作品而言，絕對標準似乎過於嚴苛。我們無法斷言，這個階段的作品將來有多少能通過歷史的嚴酷考驗而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這個問題誰也不敢遽下結論。因此，本書引用作品的標準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我們深信，作品之優劣只要經過時間的考驗與其他作品互相比較便可顯現出來。換句話說，在許多作品中，較好的作品還是能夠脫穎而出的。本書引用的作品自然以藝術價值為先決條件，但必要時仍然會斟酌考量到實際需要，而引用一些內容與形式均不甚理想的作品。

其次，我們談到研究方法。本書主要使用歷史法與內容分析法。除了依賴純粹的文學理論來解說作品的諸般現象外，往往還得借助部份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上的論點來剖析作品內容，因為當代的文學作品已成為許多學科的共同產物。唯有從每個角度來省察，才能做到全方位的觀照，也才能顯示文學主體的真正價值。

另一個有關研究的是研究目標的選定。純粹以作家作品為專題研究的目標，常常有其侷限性。新時期小說的作家多為壯年之輩，在文壇上剛剛起步不久，作品仍未完全成熟定型。如果只以某作家的幾篇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常會有過於偏狹之感，而失去對整個社會現象的細察。年長一輩的作家固然比較定型，但力求變化的仍然不乏其人。以王蒙為例，他一直在嘗試不同題材、

不同技巧。他十多年來的作品讓讀者目不暇接。如要深入研究他本人及其作品，雖然不必說要蓋棺論定，但也得費一番心思，才能挖掘、排列出他的完整文學觀。但最後發現的也不過一個作家作品中的現象而已，這是不夠的。因此，本書不準備選用此種研究目標。

換另一個角度來作研究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以作品中呈現的共同現象爲主的研究是屬於多方面的專題性的深入研究，同時它也是能夠徹底反映歷史發展線索的綜合性專題研究，因爲借助同一代人對同一問題不同角度來互參觀照，經過互相印證、駁結與補充後，我們可以把握其中蘊含的時代深刻的特点。這種研究方法亦即黃子平所謂的「宏觀研究」。至於這種研究有那些優點，我們不妨聽聽黃子平的說法：「宏觀研究絕不僅僅是一個範圍大小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種批評方法的運用，它更是一種胸懷、一種眼光，一種文學的歷史觀。它要求打破單向思維和平面思維，而採用雙向思維和立體思維。它要求把文學現象著作多層次多結構的整體。它要求在豐富的『歷史儲存』中來接受、闡述全部新出現的文學信息。」^⑤以敏銳的眼光與寬闊的胸懷，對小說作品作全方位的檢視，便是本書論述所期許的鵠的。

三、角色變遷、疏離、調適與超越

● 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宏觀研究〉，《文學評論》（一九八三年第三期），頁三六。

新時期文學的內容十分紛繁複雜，連稱呼也琳瑯滿目。文藝評論者常把內容或表達方式相近的作品加以歸納，賦予某種新的稱呼，以便研究。冠上「文學」二字者，到目前為止，就有「暴露文學」、「傷痕文學」、「覺醒文學」、「廢墟文學」、「新寫實主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派文學」、「軍事文學」、「改革文學」、「城市文學」、「鄉村文學」、「通俗文學」、「新潮文學」、「女性文學」等等說法，其中以「傷痕」、「反思」、「尋根」與「先鋒」最為常見。以小說作品實際內容為基準的分法更為繁雜，計有「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尋根小說」、「知青小說」、「軍旅小說」^⑥、「世俗小說」^⑦、「先鋒小說」、「紀實小說」^⑧、「探索小說」^⑨、「意識流小說」^⑩、「實驗小說」^⑪、「結構主義小說」^⑫、「新潮小說」、「京如周政保，^⑬寓意超越意識的滋長與強化——新時期軍旅小說創作的一種判斷》，《文學評論》（一九八七年第二期），頁七九、八五。

如顏純鈞，^⑭《文學的世俗化傾向》，《文學評論》（一九八九年第三期），頁七〇、七七。

如江冰，^⑮《紀實小說》前景質疑》，《文學評論》（一九八九年第二期），頁一五三、一五四。

如錢谷融，^⑯《論〈探索小說〉（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側面）》，《社會科學輯刊》（瀋陽：一九八九年二期三期合訂本），頁二四三、二四八。

如宋耀良編，《中國意識流小說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一九八八年）。

如崔建華，^⑰《當代『實驗小說』的困境（對實驗小說在反叛傳統中回歸傳統的現象思考）》，《藝術廣角》（瀋陽：一九八九年第二期），頁二〇、二八。

如吳亮、章平、宗仁發合編，《結構主義小說》（長春：時代文藝，一九八九年）。